

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与“劳工神圣”的口号密不可分。应如何理解这一口号？本文作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回到“劳工神圣”提出的历史语境之中。“劳工神圣”不仅牵引了民族解放，还指明了女性解放的根本路径。在新时代，重提“劳工神圣”口号依旧具有必要性。当然，在运用历史性概念之时，必须推动其内涵的新时代跃迁，如突出“创新”“创造”的核心特征，为适应当前时代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主体基础。

在新时代重思“劳工神圣”的口号

——从早期的“五一”劳动节纪念谈起

姜如雪

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与“劳工神圣”的口号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新青年》推出了史上最厚的一期专刊——“劳动节纪念号”，封面为罗丹作图的《劳工神圣》，蔡元培在扉页题词“劳工神圣”，李大钊也在开篇撰文《“五一”（May Day）运动史》中以“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来指称劳动节。当天，北京大学在组织的纪念会上倡导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五一”劳动节的明灯走向光明。此后仍有在“五一”劳动节当天发放印有“劳工神圣”字样的面包等行动出现。

“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与影响

作为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理论口号，“劳工神圣”曾一度取代“民主”“科学”成为支配性的话语。这一口号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彼时的思想界，使劳动迅速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话题，又为此后劳动光荣的社会伦理做了铺垫。那么，“劳工神圣”口号是在何种背景之下、缘何而提出？为何一经提出便能直接具有一呼百应之效，以至于时人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成了这一口号的继承者？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一口号？这一口号对于当前是否还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有必要回到“劳工神圣”提出的历史语境之中。

五四运动前夕的社会变动酝酿着深层革命，而思想界也极度活跃、交锋不止。在混杂的新思想中，引入劳动话题的先行者们尊重劳动，强调劳动，反对不劳而获。而早在20世纪初，在对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进行译介时，便出现了“劳动神圣”的表述。可以说，对劳动的关注与崇尚，在蔡元培之前便曾经由其他途径显现，却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一直到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提出：“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与此前的波澜不惊相对比，“劳工神圣”口号一经提出便形成了一股惊涛骇浪，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人们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

“劳工神圣”之成“狂热”之势，直接在于与欧战胜利的情感语境契合。这一胜利在我们当前来看无关紧要，此后巴黎和会的失败甚至使其带有荒诞和屈辱意味。但于时人而言，这一胜利却既是“公理战胜强权”的正义伸张，又是“久经列强欺侮”的扬眉吐气，当时出现了阅兵、放假等庆祝形式，形成了一时的举国欢庆氛围。归其来由，是15万中国劳工“以工代兵”奔赴欧洲帮助协约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也成为中国的参战方式。这一事实直接颠覆了国内政府、学界等“上层”群体对劳工群体的认知，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口号，并引起广泛共鸣而迅速铺陈至整个社会。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历史事件的理性反思，带有一定感性抒发

的色彩。

“劳工神圣”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劳工神圣”之为理论创造，根本在于突破传统和阶层重构的有益探索。“神”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引出万物者也”，而以儒家道德和智能承载体的“圣人”人格为代表，“圣”亦可作为道德和成就水平之形容。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劳工作为万物创造者、超群能力持有者和崇高道德之人格承载的赞美。这种赞美一方面颠覆了传统中对劳动者在社会与政治中的双重蔑视，从而以“矫枉必须过正”的形式开启了贬斥劳动到赞美劳动这一具有近现代标识的历史进程；而另一方面，将“心一力”的差别化约在共同之“劳”中，从而以“劳工一非劳工”的新区分，使过往的社会阶层认知发生了结构性演变。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传统社会的理论整合，是助推社会转型的有益尝试。

“劳工神圣”之能影响社会，主要在于内在伦理和外在行动的牵引意义。“劳工神圣”以崇尚为核心、以礼赞为目的，作为一种带有社会引导意义的价值取向，使劳动者成为一种值得推崇的角色和人格，又将劳动活动推向意义承载的神圣地位。这一方面贬斥“不劳而获”，将自食其力的劳工置于道德高地，从而塑造了对劳工的身份认同；而另一方面又使劳动与“理想生活”“人义义务”“一切乐境”联系起来，从而塑造了对劳动的价值认同。因此，“劳工神圣”在传播过程中渐渐从理论研讨扩展至行为选择，并逐渐生出实践维度，开启了劳工的群体唤醒。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劳动伦理的自发自觉构序，为主体的形塑提供了依托。

“劳工神圣”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不容忽视的是，作为正式开启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劳工神圣”口号，在其原初内涵来看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且显现出诸多理论缺陷：彼时，劳工身份实际上是作为人格承载，故而对劳工的赞美不是在寻找历史行动主体，而是着眼于个体劳动者身份获得的道德推崇；对劳动活动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劳力耗费而少有生产意蕴，故而被推崇的对象只能是主体而非活动本身；对劳动的推崇不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却为神圣意义，故而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因此，尽管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直接接受了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口号，但实际上，“劳工神圣”是经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才在自觉或不自觉间完成了其非马克思主义至马克思主义、理想主义至科学主义的内涵跃迁。

此间，“劳工神圣”契合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造则为“劳工神圣”注入了灵魂。“劳工神圣”将劳动议题带入了人们的

视野，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引入劳动创造价值、创造人和人类世界的科学观点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口号与现实中的劳动者境况对比形成的“劳动悖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指引之下完成了其理论，并导向对劳动解放的追求和对现实劳动问题的解决。因此，“劳工神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契合了分析中国被剥削境况之现实需要，从而为分析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提供了理论工具。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民族解放的路径指引，催化了社会改造的革命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劳动节纪念号”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曾强调，“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女工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从而将女性问题与劳动问题置于一处。事实上，劳动解放与女性解放本身便具有难以忽视的一致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给予女性问题的重要理论答案。“劳工”身份本身是超乎性别的，但其超越性本身却供给了平等的可能性，对劳动者、劳动活动的崇尚也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现实通道。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劳工神圣”不仅牵引了民族解放，还指明了女性解放的根本路径。

概而言之，原初意义上的“劳工神圣”虽曾发挥一定作用但整体已被历史扬弃，而完成跃迁的“劳工神圣”却在历史长河中延续其影响。正如李大钊曾指出的，由于“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劳工神圣”蕴含的崇高内涵，也就具有了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这一方面蕴含了所有人作为劳动者的、平等的地位提升，从而使“用自己的劳力做有益他人的事业”成为一种价值引导，衍生出“劳动光荣”的社会伦理；另一方面也指引了全部人作为劳动者的、共同的解放路径，神圣倡导与现实卑污形成的张力，遂而转变为实现劳动解放的推力，又生发出“劳模运动”等落地实践。

新时代重提“劳工神圣”口号的必要性

在新时代，重提“劳工神圣”口号依旧具有必要性。首先，作为对劳动者的礼赞，“劳工神圣”在打工人的话语背景之下能够重新唤醒身份识别与认同，从而为劳动者的自我书写提供引领；其次，作为对劳动活动的崇尚，“劳工神圣”蕴含的“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幸福”的伦理学表达，能够弥合“躺平”背后的价值虚无，从而为现代化的建设实践汇聚力量；最后，作为对劳动解放的牵引，“劳工神圣”能够从内部赋能“异化”的扬弃，从而为现实劳动境况改善明确路径。当然，在运用历史性概念之时，我们必须推动其内涵的新时代跃迁，如突出“创新”“创造”的核心特征，为适应当前时代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主体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阅读提示 ·

一代代中国女性，汇聚成巨大的洪流，通过劳动实现自我解放，将妇女解放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等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开拓中国道路的“她力量”。作为国内首部有性别视角的劳模专著，《中国女劳模》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女劳模走过的辉煌历程。这本书不仅是女性的文字和声音，更是帮助我们读懂中国“她力量”的一部力作。

魏南枝

时代和女性，都像河流，在日常中安静地流淌，却在每个转弯处，有力地把握方向，塑造不同的自己。一代代中国女性，汇聚成巨大的洪流，通过劳动实现自我解放，将妇女解放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等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开拓中国道路的“她力量”。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劳模》，是国内首部聚焦女性劳模、有性别视角的劳模专著，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女劳模走过的辉煌历程，是对中国道路的“她力量”的集中诠释。

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成功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指出，“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从中国共产党建党至今，中国妇女既是社会解放的对象或客体，也是民族解放、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主体，中国是妇女解放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不是一条“等靠要”的弱者之路，也不是一条主张男女对立的抗争之路，而是一条劳动解放和政治社会参与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之路。在这条路上，女劳模是实现妇女解放、全面发展的领军人物。据有关史料记载，“劳动模范”这一称谓的首次使用就是授予江西瑞金的“劳动模范范旭”。自此以后，“劳动模范范旭”带动广大劳动妇女逐渐扩大了追求独立自主、与男性共担救国责任的意识，妇女的自主意识逐渐被唤起，追求自身解放与发展的权利意识逐渐被激发，自身主体性建构逐渐生成。

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路。党的早期曾经照搬前苏联的《婚姻、家庭及监护法》的相关规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但随后迅速根据当地传统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且，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仅依靠法律条文不能保障妇女地位，关键在于妇女的经济独立，而妇女要获得经济独立，就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组织妇女参与社会生产，鼓励广大妇女在女劳模的带领下加入农会、工会、共青团和革命军等。从1943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的马杏儿、郭风英、黑玉祥等女劳模，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梁军、赵桂兰等工农兵女劳动模范，以及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晋察冀边区的“工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女劳模们身体力行地带动广大妇女投身生产、支援前线。

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路。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实现自我解放的同时，促使男女两性利益在妇女走出家庭、增加家庭收入、发展经济等方面得到统一，并提出“家庭和睦”的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提倡“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一代代女劳模充分发扬“四自”精神，既发挥作为工人阶级先进群体的引领作用，也发挥其在家庭生活中照顾家人和养育后代的独特作用。例如第一代女劳模黄宝妹的“四代同堂”大家庭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家庭”和“全国最美家庭”。

一代代女劳模的豪情和努力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人是最活跃、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没有走西方对外殖民掠夺的发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无论是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还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国民工业经济体系的人民英雄；以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各行各业奋力拼搏建功立业的人民英雄……一代代中国人为了这条道路付出了难以被估量的心血汗水，做出了无法被定价的牺牲。这条道路上，一代代女劳模带领中国女性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就是《中国女劳模》这本书所要记录和展现的！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一代代女劳模以“妇女能顶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始终引领中国妇女与时代齐奋进。从“铁姑娘”到创新创造者，从建设家园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实干中，铸就了改天换地、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女性摆脱了千百年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女性人口中的文盲率在90%以上。扫盲运动成功帮助数千万中国妇女脱盲，使传统中国没有受教育权利、没有独立经济来源、没有地位、没有尊严的女性成为生平第一次识字、走出家门、获得工作的社会主义“新女性”，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和自己的主人，开启了全面发展的征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长江上第一位女驾驶员林幼华，到女工、女民兵、女航天员、女军科技人员、女战斗机飞行员、女科学家等，女劳模们带领中国女性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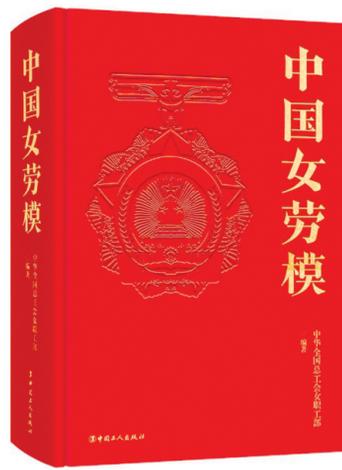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女劳模们覆盖社会各行各业，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尽显身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女劳模们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积极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把个人梦同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中国女劳模》所记载的大批女劳模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从工人、农民、战士成长为党和政府不同岗位上的干部，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接近半数。女劳模们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

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女劳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运事业和妇女事业相结合的不可或缺的群体。《中国女劳模》展现了党领导中国女性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奋斗历程，展现了中国特色妇女解放道路的全貌。《中国女劳模》这本书不仅仅是女性的文字和女性的声音，更是帮助我们读懂中国之所以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的“她力量”的一部力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展现近百年来中国女劳模走过的辉煌历程



迎「五一」学竹编

4月28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中心小学的学生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竹编。

“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新华社发 梁孝鹏摄



图志编

研究视窗

《从政治倡议到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及其精神的发展理路论析》

作者：张伟军 蒋锐 孟宪刚

“五一口号”提出建立新中国的主体、形式、程序等关键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主张的正式公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政权正式进入政治议程。本文作者认为，“五一口号”不仅是一时的政治宣言，其蕴涵的政治精神成为新中国政治结构的基础，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五一口号”蕴涵的政治精神不断建构升华，从政治倡议发展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五一口号”在新中国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和中国政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依然需要继续发扬“五一口号”的精神，坚持开展民主协商和发展协商民主，多角度挖掘“五一口号”对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重要意义。

来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12期

《妇女解放与家务劳动社会化》

作者：闫宇涵 聂诚训

当今时代，虽然大力倡导妇女解放，但家务劳动仍是阻碍妇女走向社会、实现真正自由的巨大阻力，且其价值仍未被充分承认，依旧被视为妇女的“天然”职责。不管是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还是人口再生产领域，妇女依然和男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显得极其重要。本文作者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两个途径来实现。

来源：《西部学刊》2024年第8期

（白晨 整理）